



教育管理研究系列丛书

总主编 ■ 张维平

DAXUEXIAOYUANWENHUA

SHANBIANHEGOUJIAN

大学校园文化 嬗变和构建

郭成田丽 主编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 《教育管理研究系列丛书》序

教育经济与管理是发展迅速的一门学科。其主要推动力是社会需求,一方面是理论探索,另一方面是实践运用。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和不断完善,这种需求越来越强烈。从事教育经济与管理这一学科领域的教学、研究和其他工作的人员,在满足社会需求的同时,也使这门学科不断充实。

教育经济与管理这门学科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该学科自身的建设加强了。这门学科得到社会承认,并且建立起博士点、硕士点,学科形成了自身的独有特色的体系。二是该学科的队伍壮大了。从事该学科的人员既包括高等学校的教学、研究人员,也包括中小学与该学科有关联的人员,还包括社会各界与该学科有关联的人员,这支队伍中既有专职人员,也有大量的兼职人员。该学科还建立了相关的学会等学术团体,定期召开学术会议。学科形成比较稳定的学术队伍。三是在该学科的发展过程中,其成果的数量越来越多,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宽,探讨的程度越来越深,成果的形式越来越全。该学科建立了多种专门的学术刊

物,出版了大量的著作,发表了大量的论文。可以说该门学科已经完成了确立地位的任务,正处在向更高水平发展的时期。

教育经济与管理是一门交叉学科,其核心内容是对教育经济与教育管理的主要表现及其发展规律进行多方位的探讨,其边缘部分是不明确的,具有跨学科的性质,它涉及到教育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法学、政治学、史学等学科。其边缘部分可以根据不同的标准划分到不同的学科。

教育经济与管理这门学科,不是按照人为的划定标准,而是在社会实践中发展的。人们只是在这门学科发展形成之后才根据该学科的客观存在为其确定范围的。该学科的发展并没有停止,根据目前的社会需求,该学科还不够成熟,还有大量的理论与实践问题需要探索。

为了推动该学科的发展,很多人进行了长期的探索,我们编写的这套“教育管理研究系列丛书”体现了三个特点,一是“新”,即课题新,内容新;二是“实”,即注意联系实际,避免空洞说教;三是“精”,即力求论述精辟,防止重复。承担本次丛书撰写与编写任务的作者,都是长期以来从事该门学科教学与研究的人员,可以说本套丛书是多年来不断积累的结果。

本套丛书能够与读者见面,我们应该感谢作者,他们多年来勤学苦读,锲而不舍,终于著书立说,为该门学科的发展增添了光彩。我们应该感谢沈阳师范大学的领导和同事们,多年来,教育经济与管理一直被确立为重点学科,在人、财、物等方面给予重点扶植,使该学科得到超常发展。我们应该感谢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他们为本套丛书的出版做了大量的工作,如果没有他们的鼎力相助,本套丛书不可能出版得这么快,这么好。我们还应该感谢许多为本套丛书的出版做出贡献的人们。一门学科的发展必然是几代人长期努力的结果,教育经济与管理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

本套丛书是各位作者个人的研究成果,为各位读者提供了可资借鉴和参考的资料。不过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本套丛书必然会在某些方面存在不足之处,恳望各位读者不吝赐教。

张维平

前 言

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加强文化理论,特别是大学校园文化理论的研究,是新时期深化教育改革,促进高等教育发展的需要;是加强大学校园精神文明建设,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培养德智体美诸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需要;是大力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吸纳世界其他民族先进文化,融汇现代科学精神,整合、创造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需要。因此,加强大学校园文化建设和理论研究,不仅是高等教育工作者的任务,也是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重要使命。

大学校园文化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具有社会文化质的规定性,同时还具有自身的特征。因此,加强大学校园文化建设和理论研究,必须置于整个社会文化的大背景之下进行思考。大学校园文化的嬗变和构建虽具有自身的规律和相对的稳定性,但它必然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在大学校园文化的结构中,体现着社会主流文化在校园中引起共鸣而

发出的时代最强音,当然,也存在着落后的和反主流文化的杂音。尽管如此,大学校园文化主流所代表的精神,必然是时代精神的集中反映和体现。大学校园文化是社会主流文化中的先导文化,对社会文化的前进方向具有引领性作用。所以,构建大学校园文化必须做到与时俱进,坚持与时俱进也是研究大学校园文化理论的基本原则。加强大学校园文化理论研究必须坚持创新的原则。理论创新,才能推动实践的发展,实践的发展又为理论创新提供了基础。实践发展和理论创新从来都有其内在的必然联系。因此,只有实现大学校园文化的理论创新,才能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学校园文化,增强大学校园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

探索和研究大学校园文化建设的理论并编著有关这方面的书籍,是我们多年的愿望。几年来,我们注意收集、整理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和资料,并对一些高校的校园文化建设情况进行调查和了解,为编著《大学校园文化嬗变和构建》做准备。愿望变成现实,总是需要艰辛的努力。基于此,从去年开始我们进行了实质性的筹划,并提出了编写提纲。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几易其稿,才将本书的体例确定下来。在具体编著的过程中,我们及时吸纳一些新的研究成果,不断补充书稿的内容,最后才完成全部书稿的编写工作。

实事求是地说,对文化,特别是大学校园文化理论的研究,我们仅仅是开始,许多问题还需要进一步努力探索,即便是已经编著就要付梓的这本《大学校园文化嬗变和构建》,其中许多观点和内容也是需要进一步商榷和探讨的。为此,我们将在广泛听取读者意见的基础上,继续努力,争取在大学校园文化建设和理论研究方面做一定的工作。

编 者

2001年11月

目 录

目 录

二、大学校园文化的作用	(52)
第五章 我国大学校园文化的发展沿革和展望	(62)
一、我国大学校园文化嬗变与构建的历史回顾	(62)
二、对大学校园文化前瞻性的思考	(71)
第六章 大学校园文化主要模式	(77)
一、大学校园文化模式概述	(77)
二、大学校园文化模式的一般特征	(79)
三、大学校园文化模式述析	(80)
第七章 新时期大学校园文化所受到的影响和冲击	(95)
一、传统文化对大学校园文化的影响	(95)
二、外来文化对大学校园文化的影响	(108)
三、信息技术对大学校园文化的影响	(131)
四、入世对大学校园文化的影响	(141)
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大学校园文化	(152)
六、高校后勤社会化与大学校园文化	(161)
七、大学校园体育文化建设与大学校园文化	(175)
八、高校行政管理工作与大学校园文化	(193)
第八章 中外大学校园文化的比较	(205)
一、中外文化的比较	(205)
二、中外大学校园文化的比较	(210)
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大学校园文化	(216)
第九章 大学校园文化建设遵循的原则	(219)

一、坚持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为指导的原则	(220)
二、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	(221)
三、坚持依法治校与以德治校的原则	(231)
第十章 大学校园物质文化	(235)
一、大学校园物质文化的内涵	(235)
二、大学校园物质文化的基本特征	(236)
三、大学校园物质文化的结构和内容	(238)
四、大学校园物质文化的构建	(243)
第十一章 大学校园制度(方式)文化	(247)
一、大学校园制度(方式)文化的内涵	(247)
二、大学校园制度(方式)文化的基本特征	(250)
三、大学校园制度(方式)文化的结构和内容	(255)
四、大学校园制度(方式)文化的构建	(258)
第十二章 大学校园精神文化	(275)
一、大学校园精神文化的内涵	(275)
二、大学校园精神文化的特征	(276)
三、大学校园精神文化的结构和内容	(279)
四、大学校园精神文化的构建	(282)
第十三章 大学校园文化建设效果评价	(292)
一、大学校园文化建设效果评价的重要性	(292)
二、大学校园文化建设效果评价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294)
三、大学校园文化建设效果评价的一般方法	(297)

参考文献·····	(299)
后 记·····	(303)

第一章

文化、大学校园 文化的概念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完善,对我国社会各个层面都产生强烈的冲击和影响,更新理念,按照市场规律办事,是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发展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重新审视大学校园文化的建设,加强这方面的理论研究,对于深刻理解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全面贯彻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大力推进素质教育的实施,培养和造就千百万德智体美诸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是非常重要的。

江泽民同志十分重视文化的问题,在“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中,特别提出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论断,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运用和发展。在党十四大和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同志把校园文化建设与社区文化、村镇文

化、企业文化建设,同时看作为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强大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这对于我们加强大学校园文化和理论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文化概念的浅析

“校园文化”亦称“学校文化”这一概念,最早是美国学者华勒(W·Waller)于1932年在其著述的《教育社会学》中提出的。它对校园文化所作的定义是:学校中形成的特别的文化。我们研究校园文化,特别是研究大学校园文化,必须首先对“文化”这一概念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如何界定“文化”这一概念,例来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学者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在汉语的口语系统和典籍中,“文”的本义是指各色交错的纹理,其引申为包括语言文字在内的各种象征符号,具体为文物典籍、礼乐制度和与“德行”对称的“道艺”等;又由纹理之义导出彩画装饰之意,引申为修饰,人为加工,经纬天地,与“质”和“实”对称。进一步引申为美、善、文德教化,以及文辞、文章,与“野”对称或与武事对称。

“化”则有变改,化生、造化、化育等意,归纳起来讲,是指两物相接,其一方或双方改变其形态性质。由此层内涵进一步引申为教行、迁善、告谕、使人回心、化而成之等。

我国早在先秦时期的文献中,就对“文化”有所论及,《易·贲》云:“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在这里“文”与“化”虽然被分开使用,但已有“以文教化”之义。从西汉起“文化”作为词已正式出现了。西汉刘向的《说苑·指武》云:“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南齐王融《曲水诗序》云:“设神理以

景俗，敷文化以柔远。”晋人束皙《文选·补之诗·内仪》云：“文化内辑、武功外悠”。这些都是说“文化”与“武功”相对应，是文教治理的总称，是一种治民的理论、措施和方法，或是指封建国家的礼乐制度、法令条文等。这里的“教化”之义是值得吟味的。

今天研究和探讨“文化”一词，则是从更为广泛和深刻的现代背景和含义而展开的。

“文化”一词原义为拉丁文(Cultura)，含有耕种、居住、练习、留心或注意、敬重等意思。英文(Culture)、法文(Culture)、德文(Kultur)乃至俄文(Культура)中的“文化”一词均是由拉丁文演化而来的。19世纪中叶，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等人文科学在西方兴起，“文化”一词开始被广泛的应用并具有现代意义，成为这些新兴学科的重要术语。

被誉为“人类学之父”的英国人泰勒(E. B. Tylor)先后给“文化”下过两个定义，一个是：文化是一个复杂的客体，包括知识、艺术、宗教、神话、法律、风俗以及其他社会现象。他的另外一个定义是：文化是一个复杂的客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类在社会里所得到的一切能力与习惯。英国人类文化学家马林诺斯基则认为：文化是完整的全体，其中包括具体物(使用的器皿和生活消费品)和无形的思想(信仰、习惯、制度等)。法国学者维克多·埃尔在《文化概念》一书中指出：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一书中关于文化一词的定义是最准确的，即文化是风俗、习惯，特别是舆论。它的特点一是铭刻在人的内心；二是缓慢诞生，但每天都在获得新生力量并取代权威力量；三是能够维持人们的法律意识，激活已经疲软的法律或已经兴亡的法律。而美国学者沙因则认为，文化是由一些基本假设所构成的模式，这些假设是由某个团体在探索解决外部环境的适应和内部的诸多问题这一过程中所发现、创造和形成的。这个模式运行的良好，则可以认为行之有效。

新成员在认识、思考和感受问题时必须掌握的正确方式。

在 18 世纪末之前,西方学者对文化的解释中,最有影响的是以下三种观点:

1. 方式论

认为文化是一定的民族的生活方式,是一种并非由遗传得来的生活方式,这里包括了人们的兴趣、爱好、风俗、习惯,强调了文化的传承性。

2. 过程论

认为文化是人类学习和制造工具,特别是制造完整工具的过程,这里面包括了人类智力和创造能力的不断演化,强调了文化的演变过程。

3. 复合论

认为文化是作为社会成员所获得的包括知识、信仰、艺术、习俗、法律以及其他种种能力的复合体。

对 Culture(文化)和 Civilization(文明)的词义,在世界文化研究史中是有过争议的。前者通译为文化,后者翻译为文明。法、英、美社会学家在指称文化时,常常使用 Civilization 这个词。德国历史哲学家则常常使用 Culture 这个词。这种争议,体现了西方文化研究中起支配作用的两种对立传统,实证的社会传统和思辨历史哲学传统。英美传统的文化研究者将文化理解为既定事实的各种形态的总和,即将文化视为人类创造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而德国传统的文化研究者则将文化理解为一种以生命或生存为本质的东西,或者说是生存的标志。在德国传统的文化研究者看来,文化的形态化、制度化、模式化正意味着文化的死亡。因此,他们有文化是活着的文明,文明是死了的文化之类的观点。我们认为,在许多情况下,文化(Culture)与文明(Civilization)是不分的,在文化研究方面,既需要面对既成事实,又不能把这既成事实变成是僵死

的、凝固的东西,而应当就这些既成事实进行深刻的思考,掌握其精神实质,把握其中规律性的东西和活的灵魂。应该说,活动方式和活动成果作为文化的两个方向,总是互相依存、互相制约并在互相作用中一起促进的。因此,文化与文明既有精神文明、精神文化的概念,又有物质文明、物质文化的概念。

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文化作了一种新的解释,即把文化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如前苏联哲学家罗森塔尔·尤金认为,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比较狭隘的意义上讲,文化就是在历史上一定的物质资料生活方式的基础上发生和发展的社会精神生活形态的总和。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虽然对经济、政治都有过论述,也多次谈到文化问题,但缺乏系统的文化理论,对文化这个概念的理解也不一致。例如,列宁在多数场合把文化理解为精神性的东西,有时也理解为物质性的东西。十月革命以后,针对有些人认为“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水平……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的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的人民呢?”^①在这里,列宁把文化水平理解为生产力水平。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采取了以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理论框架来考察中国社会,对经济、政治和文化之间的关系和文化在人类社会中的地位作了明确的规定,并对当时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现状和前景作了分析,其中对中国文化问题作了较详细的论述。毛泽东同志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的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

^① 《列宁选集》中文第2版,第4卷,第777页。

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① 他接着又分析了中华民族的旧政治、旧经济和旧文化,又专门论证了中华民族传统应具有的新政治、新经济和新文化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他特别分析了自“五四”运动以来的中国文化在政治和经济的推动下从旧文化向新文化演变的过程,最后提出结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推动下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新文化。”^② 可以说,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是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形成的标志。

我国学术界对文化问题的关注始于20世纪20年代前后,随着西方人类学、民族学的引进而开始的。“五四”运动以后,围绕着东西方文明比较研究,什么是文化,如何看待和发展中国文化等问题,一时间成了学术界热烈讨论的重要议题,其中关于“文化”一词的界定则出现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局面,蔡元培、梁漱溟、梁启超等思想大家都对“文化”进行过界定,这一时期对文化研究与国家命运、民族启蒙、社会改良等紧密地联系起来,赋予了深刻的时代精神,也奠定了后世研究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不用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理论框架来分析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我国的理论界对于文化理论缺乏系统、全面和深入的研究,对许多基本理论问题的认识不是很清楚。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文化热又在大陆兴起,文化定义也是多种多样,同时对国外与港台对于“文化”的认识进行了引进。总体上看,国内一般将文化的含义进行了广义与狭义的区分,广义的文化现象等同于社会现象,狭义的文化现象就是精神现象,不包括客观现象或物质现象。著名学者任继愈认为,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包括文艺创作、哲学著作、宗教信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3—664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663—664页。

仰、风俗习惯、饮食器服之用等等。狭义文化,专指能代表一个民族特色的精神成果。张岱年和程宜山则认为:“文化是人类在处理人和世界关系中所采取的精神活动与实践活动的方式及其所创造出来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是活动方式与活动成果的辩证统一。”^①《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对文化的界定是: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总和。狭义的文化是指语言、文学、艺术及一切意识形态在内的精神产品。哲学卷的界定是:广义的文化总括人类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能力,物质的和精神的全部产品。狭义的文化指精神生产的能力和“精神产品”,包括一切社会意识形态,有时也专指教育科学、文学、艺术、卫生、体育等方面的知识和设施,以与世界观、政治思想、道德等意识形态相区别。社会学卷指出了“文化”的中西渊源,并说:文化一词的中西两个来源,殊途同归,今人都用来指称人类社会的“精神现象”。这种表述只是简单的概括性的所指,历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通常多在广义上使用文化概念。文化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和历史现象,它是一个动态系统,在人本身自然和身外自然的基础上不断创造和演化,在这一过程中,人本身的自然和身外自然都不断得以改造,进而使人不断从动物中提升起来,而人本身自然和身外自然的改造过程则是无限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在社会活动中所创造的成果还不是文化只能是文,只有考虑到这些成果同时还对人自身的改造具有极为重要作用时,才是文化。就此而论,我们对文化的概念,从社会学和哲学两个角度进行分析,社会学对文化概念的界定是:文化就其本义而言,是指人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它反映于社会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上的技术进步,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方面,在教育、科学、文

^① 张岱年、程宜山,《中国文化与文化改革》,1990年出版。